

·经济建设·

城乡一体化研究推动苏州新型城镇化建设

十八大报告确定的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将直接推进我国城市在“五位一体”总布局下的系统转型,并由此带动科学城镇化体系的形成。面对未来近 20 年的新一轮城镇化加速期,我国城市必须超前谋划转型发展之路,特别是一批已经初步形成了规模竞争优势的特大城市、大城市以及所带动的城市群,理应树立国际标杆,以建立现代产业体系、生活体系为基础,朝创新型、智慧型、生态型、宜居型的现代化都市目标迈进,探索出一条以城市转型发展来引领国家和区域现代化发展的新路径。

苏州作为长三角这个城市群上比较活跃的的城市之一,其经济发展的最大特点是外向型经济为主,以出口导向为主的经济构成了城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随着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主要

是欧美金融危机导致发达国家的市场容量和结构的变化,加上国内长期高速增长带来的劳动力、土地和环境容量等传统生产要素的稀缺性表现得越来越突出,这使得出口导向为主的外向型发展模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成为苏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战略选择。经济模式转型必然促进苏州城镇化模式的转型。城乡一体化是苏州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如何推进苏州在新的发展阶段城乡一体化的建设是苏州市面临的战略选择,其城乡一体化的建设和发展对全国也具有现实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近日,由我校东吴智库研究员、中国城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段进军教授领衔的《苏州城乡一体化研究报告》正式完成。该研究报告受苏州市发改委委托,于 2013 年年底立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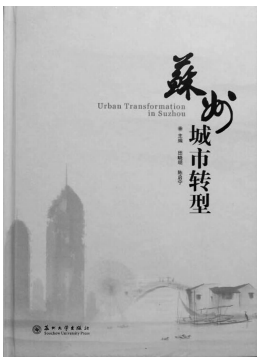
接到任务后,段进军教授精心组织专家,通过实地调研、召开座谈会等形式,于 2014 年 3 月底完成了研究报告的初稿。目前研究报告已得到了市发改委的肯定和认可,其姊妹篇《苏州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也在积极酝酿中。

段进军教授长期致力于城市转型、健康城镇化、苏南城乡一体化等课题研究。他认为,我国城镇化的空间须转型,即由蔓延式转向紧凑型城镇化,不能把城镇化简单地等同于人口转移和经济发展的过程,而忽略了城镇化对社会结构的作用和社会影响,忽略城镇化过程中的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城镇化是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和制度的变迁过程,是一个广泛涉及和涵盖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发展过程。由蔓延到紧凑的城镇化转型,是空间的转型,更是社会

人文的发展。

此次,《苏州城乡一体化研究报告》由段进军教授组织团队对苏州工业园区、新区、相城区、吴中区、吴江区、昆山、太仓、常熟、张家港等地进行实地调研,就城乡一体化的空间结构调整及产业布局、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城乡一体化社会治理创新、农民基本权益保障、城乡一体化的文化建设、城乡一体化的生态环境机制探索、城乡一体化金融机制的创新、城乡一体化的目标与指标体系构建等八个方向展开研究。该研究紧抓苏州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结合国际国内的经验解读,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深刻剖析了苏州城乡一体化的历史演变和深层逻辑、七大难题及对策、指标体系建构和实现路径,为苏州新型城镇化道路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现实指导。

《苏州城市转型》举行新书发布会



5 月 21 日,《苏州城市转型》新书发布会在苏州中茵皇冠大酒店举行。出席发布会的有原新加坡国会议员、新加坡邦城规划顾问公司主席曾士生,苏州大学副校长田晓明,苏州工业园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杨知评,新加坡邦城规划顾问有限公司中国区总裁、中国董事、总规划师陈启宁。会上,由新加坡贸易与工业

部政务部长张思乐先生为新书揭幕。

《苏州城市转型》是由我校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与新加坡邦城规划顾问公司共同合作完成的一部应用性学术专著,是作为对苏州工业园区成立 20 周年、邦城规划顾问有限公司成立 10 周年的一份献礼。

发布会上,我校东吴智库研究员、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邦城未来城市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段进军教授介绍了《苏州城市转型》一书的基本情况。此书从多学科多方面切入,结合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城市规划学等学科视角,对苏州城市规划与建设作了全面、深入的系统研究。本书前半部分涉及

经济、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转型;后半部分主要针对重大专项领域,比如交通、旅游、城市空间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研究。

此次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本《苏州城市转型》,提出了一系列创新观点:由“后发优势”向“先发优势”战略转变、构建创新生态系统对于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重

大意义、“双轮驱动”和区域财富创造的理念、加强社会建设的重大意义等。对于苏州和苏州工业园区的转型具有现实的参考性。

在当前我国城镇化进入全面转型的关键时期,苏州作为全国城镇化发展最好的区域之一,该书对苏州的解读为全国各地进行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

本期要目

- 城乡一体化研究推动苏州新型城镇化建设
- 《苏州城市转型》举行新书发布会
- 中国典籍翻译应当是文化走出去的先行者
- 休闲与旅游文化研究推动江苏旅游发展
- 生态文明建设研究为地方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文化建设·

中国典籍翻译应当是文化走出去的先行者



文化不但是民族凝聚力的集中体现,而且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了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中国文化典籍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典籍的外译是文化输出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华典籍的翻译一直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我国历史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中华典籍不但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而且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上自古神话,下至清代学术,前后数千年的重要作品,包含着中华文化遗产的全部精华,而如何更好地向世界传播这些优秀

的中国文化典籍则是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弘扬民族文化,开展中西文化交流的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近日,由我校东吴智库专家、典籍翻译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宏教授主持英译的全英文国际版《清代城市生活长卷》(The Urban Life of the Qing Dynasty)由英国帕斯国际出版社(Paths International Ltd.)正式出版并在全球发行。与此同时,由王宏教授担任总审校的《唐代城市生活长卷》(The Urban Life of the Tang Dynasty)、《宋代城市生活长卷》(The Urban Life of the Song Dynasty)、《元代城市生活长

卷》(The Urban Life of the Yuan Dynasty)《明代城市生活长卷》(The Urban Life of the Ming Dynasty)也在近日由英国帕斯国际出版社(Paths International Ltd.)正式出版。

《清代城市生活长卷》属《中国古代城市生活长卷》系列丛书之一,经过严格的专家评审程序,于2010年列入“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该系列丛书依据史料,真实叙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民情、风俗等诸方面,生动展现了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中国古代城市文化传统。

《清代城市生活长卷》全书分为:卷首“四海之内”;第一章“权力之家”;第二章“九千九百九十九间房”;第三章“最后的盛世”;第四章“不能被人遗忘的角落”;第五章“平静与喧嚣”;结语“走出城墙的藩篱”。该书生动翔实,图文并茂,制作精美,对清代城市生活进行了全景式的详尽介绍。为把这本具有浓郁中国传统特色的历史文化读物向海外推介,王宏教授及其翻译团队以国外读者需求为中心,使用“简洁、明白、畅晓”的英文,历

时两年,终于交出了一部高质量的英文译著。该书于2014年正式在全球出版发行。

《清代城市生活长卷》的翻译出版,是继《梦溪笔谈》、《明清小品文》、《教育实践与理论探索》、《图说中国传统玩具与游戏》等全英文国际版由英国帕斯出版社(Paths International, Ltd.)、美国麦格劳-希尔教育出版公司(The McGraw-Hill Education Companies)和美国环球电子出版有限责任公司(Global ePress, LLC.)在全球出版发行后,王宏教授领衔的翻译团队取得的又一重要成绩。

近年来,在汪榕培、王宏等知名专家的带领下,我校翻译团队承担了“大中华文库”、“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等多项国家出版重大工程,并在推介苏州地方文化和联合国文件翻译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称羡的成果。目前,该团队正总结经验,制定中长期规划,力争在中国典籍英译、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译等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努力把我校打造成我国典籍翻译及研究领域的重镇,成为“文化走出去”的先行者。

我校东吴智库专家设计作品入选为第53届世乒赛会徽、吉祥物

近日,第5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筹委会正式公布了本次赛事的会徽和吉祥物“乒宝”造型。值得自豪的是,本次赛事的会徽与吉祥物设计,均出自我校东吴智库专家之手。会徽由艺术学院院长助理、视觉传达系教师张大鲁副教授设计,大赛吉祥物则由在读研究生马晓晴、武源共同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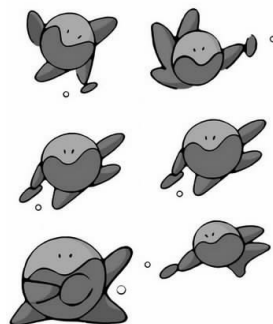
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是国际乒联举办的最高水平乒乓球赛事。第53届世乒赛将于2015年4月至5月在苏州举

办,这也是苏州首次承办国际性体育赛事。2013年底,赛事筹委会面向全国发布世乒赛会徽、吉祥物的征集启事。截至今年1月底,赛事筹委会共收到会徽作品480件,吉祥物作品123件。根据评审程序,经专家评审委员会多轮评选,从所有有效应征作品中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在此基础上,筹委会在听取社会各方意见后,最终确定了2015年苏州世乒赛的会徽和吉祥物。

张大鲁老师设计的会徽以苏州石桥和地球运行弧线为元

素,体现了典雅的江南水乡特色。马晓晴、武源设计的吉祥物则以“东方水城与乒乓的相遇”为创意,展现了一个卡通的乒乓爱好者挥拍打球的造

型。用水把苏州与乒乓球联系起来,抽象地表现了乒乓球飞动激起水花的那一刻,象征着世界各国热爱乒乓球运动的人民来苏州享受运动的快乐。



·文化建设·



休闲与旅游文化研究推动江苏旅游发展

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文化旅游正成为一种备受青睐、生机盎然的旅游形式。文化因素对现代旅游活动的影响,将会更加深刻和深远。要加快中国旅游业的发展,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就必须高度重视旅游文化建设。这是旅游文化本质特征的必然要求。无论是自然旅游资源还是人文旅游资源,要吸引和激发起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就必须具有魅力无穷、独具特色的民族、地方文化内涵,满足人们对科学、史学、文学、艺术和社会学等方面的不同需求。旅游的文化本质特征必然要求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优先发展旅游文化。旅游文化是一个国家旅游业保持自身特色的决定因素。

我校东吴智库研究员魏向东教授致力于休闲与旅游文化研究,通过对国际旅游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应用,以江苏国际旅游客源市场为例研究时空压缩与客源市场空间结构演变,探析遗产旅游体验模式,同时结合各旅游城市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研究,为地方政府提出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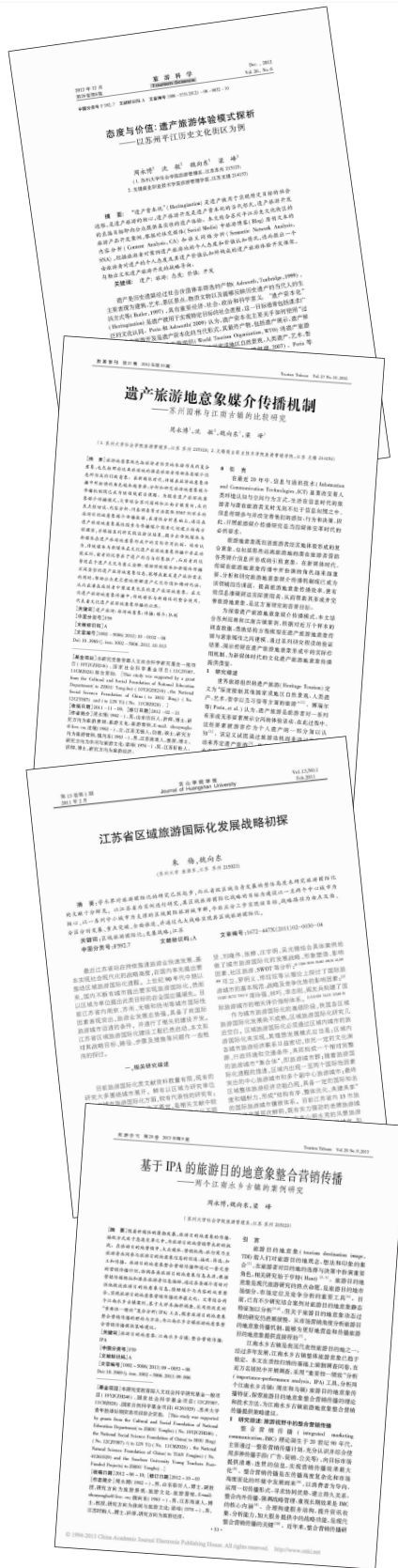
旅游地意象既包括旅游者经实地体验形成的复合意象,也包括那些远离旅游地的潜在旅游者借助各类媒介信息所形成的引致意象。在新媒体时代,传媒在旅游地意象传播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分析和研究旅游地意象媒介传播机制现已成为该领域前沿课题。魏向东教授团队结合苏州园林和江南古镇的案例,借助结构方程模型在遗产旅游地意象传媒与意象属性之间建模,通过系列研究假设的验证结果,揭示传媒在遗产旅游地意象形成中的实际作用机制,为新媒体时代的文化遗产旅游地意象传播提供借鉴。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文化遗产旅游地意象传播中存在功能互补,前者的优势在于遗产形态与形象推广,而后的优势则在于遗产文化与意义诠释。借助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传播不同类型的遗产旅游地意象信息,能够在激发遗产旅游需求的同时,帮助公众更完整地理解遗产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从而在潜在旅游者中塑造更优良的遗产旅游地意象。在文化遗产旅游地意象传播

中,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整合使用,代表着文化遗产旅游地意象传播的必然。

江苏省站在持续推进旅游业快速发展、基本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在国内率先提出要推动区域旅游国际化进程。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国内不断有城市提出要实现旅游国际化,然而以区域为单位提出此类目标的在全国应属领先。目前江苏省内南京、苏州、无锡和扬州等城市国际性因素表现突出,旅游业发展态势强,具备了向国际旅游城市迈进的条件,并进行了相关的建设开发。目前旅游国际化类文献资料数量有限,现有的研究大多围绕城市展开,鲜有以区域为研究单位的。作为城市旅游国际化的高级阶段,我国各区域旅游国际化发展尚不成熟,区域旅游国际化研究几近空白。

针对江苏省区域旅游国际化发展战略,魏向东教授认为,为了实现江苏区域旅游国际化的战略目标,除了在空间布局上要履行城市化进程中的空间集聚战略,选择重点城市,全力突破外,还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战略:城市旅游同步发展战略;全球化进程中的跨文化营销战略;个性化时代的旅游产品创新战略;信息化时代的点对点服务战略;城市旅游中的人才优先战略;市场经济浪潮中的主体培育战略;目的地竞争中的合纵连横战略;环境友好型社会中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魏向东教授以苏州旅游文化为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策划。包括苏州西部生态城旅游度假区概念性规划和可行性研究、苏州乐园旅游总体规划等。并在基于FEA视角的旅游标准化体系研究中,引进美国联邦跨企业标准化管理规划的经验,根据中国省市级的实际情况,探索了苏州这样的旅游城市如何编制旅游标准化规划的问题。这些规划在对苏州生态城旅游发展现状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明确了苏州生态城旅游度假区发展的目标、战略,定位明确,战略可行,契合苏州旅游发展实际,对江苏省乃至全国的城市旅游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研究为地方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全面建设、整体发展和整体文明理论的继承和创新。深刻认识生态文明建设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紧密关系，自觉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突出地位，从根本任务和基本国策的高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对于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认真应对和解决日益严重的生态矛盾，确保生态安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五位一体的权益，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校东吴智库研究员方世南教授在丰厚的基础性、原创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紧抓我国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生态文明建设问题，率先对这一前沿问题作多角度深入研究。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理论和党的政策方针指导下，方教授从生态环境、生态现代化、生态权益、区域生态合作治理和循环社会建设等多个维度研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的生态文明建设问题。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的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和重要保证，努力从提升人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文明价值观，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建设生态文明，尔后以生态文明的优势来保障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将生态文明推进到一个更高阶段，在实践中坚持走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的、既能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生态现

代化作为一种崭新的和完备的现代化理论，作为一种全新的绿色实践运动，带给人类的必将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即生态社会，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追求、根本保障和主要路径。生态权益作为人权的重要内容，是直接影响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性和根本性的重要权益。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人的生态权益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凝聚和体现，反过来又构成了促进人的生态权益实现以及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外部自然条件，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区域生态合作治理和循环社会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和举措。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各行政区域和生态区域合作联动的整体系统性建设。只有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确立区域统筹协调的经济发展与生态优化的共同体意识，通过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建立多元联动的区域生态合作治理机制，采取

区域生态合作治理行动，才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实效。建设循环社会，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为指导，借鉴和吸纳世界上先进国家发展循环经济和建设循环社会的积极成果，从价值观念、法制建设、技术创新、公民参与以及创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方面整体性地推进。

方世南教授从事生态文明建设研究数十载，结合苏州实际情况，以自身丰富研究成果和《苏州市生态文明建设规划》为基础，积极探索和研究苏州市的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和文明发展的新型之路，为将苏州建设成为全国率先实现科学发展的智慧城市、低碳城市和“宜居、宜业、宜游、宜商”的生态文明城市提供理论支撑、智力支撑。方教授的“生态文明建设”主题研究系列部分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期刊广泛转载和引用。



•成果巡礼•

编者按：所谓新型城镇化道路，是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并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相协调的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的城镇化道路。与传统城镇化相比，新型城镇化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以人为本”。这要求我们必须逐渐从“以物的城镇化为主”向“以人的城镇化为主”转变，从重视“量”的扩大向重视“质”的提升转变，从“外延式”扩张到“内涵式”发展转变。新型城镇化并不是简单的人为“造城运动”，更重要的是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努力促进“人的城镇化”。

人的素质，包括人的认识能力、民主法治的素养、伦理道德素质，将成为“人的城镇化”的“压舱石”，以建设公民道德助推“人的城镇化”将成为中国式的城镇化道路。《苏州日报》2013 年 5 月 25 日 A02 版刊发了我校东吴智库研究员李兰芬教授对公民道德建设助推“人的城镇化”的全面解读。现将全文转载如下：

公民道德建设助推“人的城镇化”

李兰芬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城镇化”、“城乡发展”等词被多次提及，城镇化发展进程也得到了密切的关注。从以人为本的视角出发，城镇化绝非简单引导农村人口进入城镇，而是一个“人的城镇化”的过程，而这也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难点。

“人的城镇化”不是个道德问题，但没有人的道德素质全面提升，“人的城镇化”既难以实现更不可持续。尤其是进入全面社会转型期的苏州，城镇化的要素结构、动力机制和价值取向将发生明显变化，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开始持续下降，工业化对城镇化的拉动明显减弱，人力资源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也就是说，伴随“五位一体”协同发展的战略格局，人的生存方式和精神状态将成为城镇化发展的主体要素、动力源泉和价值诉求。

如何实现“人的城镇化”？一个核心观点是，不能将“人的城镇化”止于土地、户籍和社保的硬件制度安排。如果把土地、户籍和社保的硬件制度安排就当是是实现“人的城镇化”的全部条件，这不仅消解了人们参与城镇化事务、承担城镇化责任的主体价值，也更难以解释和重塑在同种土地、户籍和社保制度体系中，人为什么会有不一样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思考逻辑和礼仪举止。

“人的城镇化”背后，必然蕴涵着人类价值理念的革新和文化历史传统的铺陈。一个可欲的、惬意的“人的城镇化”，既有富强所表征的充沛物质分享，更有类似“中国梦”这种理想信念所支撑的精

神家园。物质分享和精神家园的和谐共生和同步成长，才是“人的城镇化”憧憬中最具感召力的理想图景。

根据道德文化分析的思路，“人的城镇化”创造着公民道德的社会条件，公民道德建设重塑着“人的城镇化”的道德心理结构。对“人的城镇化”而言，公民道德在很大程度上既是内容、结果，更是精神引擎。在低城镇化水平条件下，老百姓的优先目标是获得衣食住行等物质条件，在城镇化水平提升之后，老百姓的价值观将发生从物质需求到后物质主义目标的“精神转向”。

社会资源和政治技能的流动性分布，期待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妥协节制的公共参与和协商合作的公民行动，建设公民道德将成为一种支持“人的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相对独立的主体工程。户籍、社保和土地是城镇化不可或缺的制度保障，而修身养性成就的公民美德，作为“人的城镇化”集体行动中个体公民的一种道德素质，则可以参与各级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企业组织，发挥户籍、社保和土地制度红利的认识能力、民主法治的素养和社会心态等。秉持道德理想，遵循公民理性，构筑民生幸福之梦乃是“人的城镇化”所应诉求的道德逻辑。

但是，“人的城镇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其复杂性就在于，从顶层设计的“五位一体”的城镇化，到实际造福于人民的城镇化过程，虽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但其整个过程发展的方向和结果，不再只是决定于作为城镇化诸多要素内在本

质联系的必然规律（譬如土地、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而是直接取决于作为城镇化主体的人的行为抉择的价值方向、操作手段和社会心态。因此，一种良序的“人的城镇化”，应奠基于合规律性的“制度安排”和合目的性的“意义诉求”的双重基座。无论“制度安排”还是“意义诉求”，其效应都将受制于人的行为抉择的合宜与否。因此，人的素质，包括人的认识能力、民主法治的素养和伦理道德素质，将成为影响中国“人的城镇化”的“压舱石”。

一个国家、地区的城镇化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社会成员的公民道德素养。以建设公民道德助推“人的城镇化”将成为中国式的城镇化道路。那么，何为公民道德？如何将公民道德建设导入“人的城镇化”进程，并使“人的城镇化”经由自身的建制化将自己托付于微观公民道德的建设和养成？前者则是一种规范论命题，而“人的城镇化”建构和公民道德建设的历史，常常恰恰是以规范论意义上的论述为先导的。后者则为一个发生论的叙事，对于“人的城镇化”来说，也是一个目的论的叙事。只有托付于养成优良道德的公民主体，才能真正获秉“人的城镇化”的价值尊严和精神动力。作为中国城镇化示范区、先行区的苏州，需要对道德领域突出问题（如社会诚信、食品安全、交通拥堵等等）作出自觉的理论回应和实践探索，以打造新一轮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建设中的苏州公民道德优势。



·成果巡礼·

编者按：近十多年来，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无论从总体规模还是发展速度上看，都是非常惊人的，但其政府主导型的推进模式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城镇化作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必须实现重大的转变。我校东吴智库专家章志远教授从目前城镇化推进对行政法治发展构成挑战的角度，提出我国行政法治发展模式应当实现“从对抗型向合作型”、“从压制型向回应型”的转变。其咨询报告《城镇化背景下我国行政法治发展的挑战与回应》刊发在苏州市人民政府研究室《调研通报》（增刊）2013 年第 1 期（总第 52 期），现将主旨内容摘编如下：

城镇化背景下 我国行政法治发展的挑战与回应

章志远

2012 年 3 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宣布“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 50%”。这个数字表明中国的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对于一个有着数千年农耕传统的国家来说，这无疑预示着社会结构的剧烈变迁。

一、我国城镇化的变迁

回望近三十年来中国城镇化的迅猛推进，不难看出，城镇化背景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出现了三个方面的明显变化：首先，城镇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乡村逐渐被消灭、城市和小城镇不断扩张的过程。其次，城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人口大规模迁徙和布局重组的过程。最后，城镇化的过程更是一个生活生产方式、价值观念乃至社会关系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过程。

与欧美国家主要依托市场机制自主发展的城市化推进模式相比，中国的城镇化完全是一种政府强力主导的推进模式，举凡城镇的规划选址、土地的征收补偿、新区新城的功能定位、旧城改造的实施方案等城镇化进程中的诸多问题，都是在行政权力的直接介入下实现的。政府主导型的城镇化推进模式能够发挥现行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点，在短时间内通过各种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实现城镇化率的快速提升。但是，中国人口数量庞大、城乡差异显著、贫富分化悬殊的特殊国情又增加了城镇化的推行难度和运行风险。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权力至上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家，行政主导的推进模式极有可能引发侵害农民利益的“被城镇化”现象。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

提出，到 2020 年“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以中国城镇化率过半为契机，立足整体观、运用系统论反思城镇化背景下我国行政法治发展的挑战与回应就显得格外必要和迫切。

二、我国城镇化进程 对现行行政法治构成的挑战

总体来说，我国城镇化的迅猛推进对行政法治发展构成了如下三个方面的挑战：

（一）加剧了行政组织法的空洞化。长期以来，行政组织法的粗漏和滞后一直是我国行政法治建设中的“瓶颈”。大部制、省直管县等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大多属于决策高层的顶层设计，同基层政府的现实需要之间还有相当距离。

（二）凸显了行政行为法的单一化。首先，就行政立法和决策而言，政府主导型的模式导致了民主性和科学性的双重缺失。其次，就行政执法而言，一线执法力量下沉并向乡镇延伸，固然可以满足面上管理需要，但城市与城镇之间存在较大差别，城市里的行政执法模式并不能简单套用于城镇。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城镇化的推进消灭了大量乡村，加剧了传统文化的失落，也增加了整个社会运行的风险。

（三）暴露了行政救济法的无力化。政府主导型的城镇化推进模式导致官员政绩与民众诉求之间的严重断裂，官民对立不断增强，行政纠纷表现出复杂化、群体化的发展态势。为此，应当正视行政救

济法无力化的局面，充分理解失地农民的生存保障就是转型中国最大政治的时代命题，使失地农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矛盾的化解回归到法治轨道。

三、我国行政法治模式应当实现转变

城镇化是一个无法逆转的趋势。21 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城镇化率将继续攀升，直至接近西方发达国家 80% 的城市化率。面对上述城镇化推进对行政法治发展提出的诸多挑战，我国行政法治发展模式应当实现转变。

（一）“从对抗型向合作型”转变

事实证明，这种政府主导、民众被动接受的城镇化模式正是诸多社会问题产生之源。为此，在行政法治发展的模式上就必须实现从对抗型向合作型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在行政法治发展的动力源上，应坚持公私合作的发展策略。充分调动一切有利的民间社会资源，通过多领域、多层次和多形式的公私合作，推动行政法治的实现。其次，在行政法治发展的工具单上，坚持刚柔并济的发展策略。除慎重使用处罚、强制、命令等传统的刚性方式以外，要大量使用指导、契约、奖励、扶助、评估、和解等新兴柔性活动方式，因势利导，充分释放民众的智慧和创造精神，推动合作型行政法治的实现。

（二）“从压制型向回应型”转变

这一转型主要体现在行政法治发展思维和重点两个方面：

首先，在行政法治发展思维上，应坚持预防性和均等化思维。以城镇化推进为例，在城镇化决策之前就应当进行各种信息的采集和研判，对城镇化实施可能产生的各种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进行充分评估，努力实现“决策于未知之中”。当城镇化不断推进之后，就应当充分考虑不同利益群体的实际诉求。无论是大城市居民、小城镇居民还是留守故土的农村居民，都应当能够体面而均等地享有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在城镇化的浪潮中幸福地生活着。其次，在行政法治发展的重点上，应坚持培育行会和扶持弱势的优先原则。政府应当以社会管理创新理念的提出为契机，大力培育各种行会，为公私合作发展策略的落实奠定组织基础。同时，在社会阶层分化、固化的形势下，应当坚持扶持弱势的施政理念、落实社会的公平正义。经过一系列的努力，中国的行政法治事业必将在城镇化进程中浴火重生。

·权威视点·

编者按：现代意义上的智库主要以专业、客观、独立的方式提出公共政策主张，帮助决策者制定和推行政策，并就有关政策进行论证、评估。智库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高质量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时代要求。我国智库建设必须真正承担起时代赋予的重任，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才能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风格的智库发展之路。



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之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李伟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近年来，习近平同志两次对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高度重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等。这些重要论述既表明智库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又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指明了根本方向、提出了总体要求。

智库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智库又称“思想库”，一般是指研究公共政策的专业机构，主要职能是提供高质量的思想产品，为公共决策者解决经济、政治、社会、外交等方面的问题出谋划策。现代意义上的智库产生于 19 世纪的西方国家，是社会分工精细化和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结果。上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科技进步，世界政治力量格局和经济秩序持续发生重大变化，各国面临形势和环境的复杂性不断增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以个体形式为主的谋士、幕僚的能力已远远不能适应决策者应对挑战的需要，迫切需要团队形式的智库为决策者提供更高质量的专业咨询和政策方案。各类智库由此得到快速发展，决策咨询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政策影响力日益扩大，决策层与智库的关系愈加紧密。智库逐渐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据有关机构统计，到 2013 年全球各类比较活跃的智库已达 6826 家。美国在二战前只有布鲁金斯学会、胡佛研究所等 20 多家智库，到 2013 年智库的数量已增至 1828 家，形成了与其社会治理体制相适应、较为完善的决策

咨询体系。

现代意义上的智库主要以专业、客观、独立的方式提出公共政策主张，帮助决策者制定和推行政策，并就有关政策进行论证、评估。由于社会治理体制、文化传统、发展阶段等原因，西方发达国家的智库多以政府体制外的社会性智库为主；而在东亚地区，一些主要经济体的政府在上世纪后期主动建立大量智库，形成了以“官办”智库为主的东亚特色。无论智库的属性如何，它们都在当代国家的发展和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方国家政府或政党提出政纲和各类法案、议案，通常会与智库进行深入讨论和反复论证，有时直接采用智库的建议方案。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在里根执政期间完成了《今后十年的对华政策》，报告中的主要观点成为当时美国政府处理中美关系的重要依据。美国兰德公司对苏联第一颗卫星发射时间、越战撤军、中美建交、古巴导弹危机、德国统一等国际重大事件的成功预测和战略研判，奠定了其在美国政府决策中的地位，为其赢得了世界著名智库的声誉。可以说，二战后美国政府推出的每一项重大战略的背后，都可以找到智库的影子。另外，西方国家的议员们在立法机构就各类公共政策发言或辩论，背后往往是不同智库主张之间的交锋。日本综合研究所提出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指导日本顺利度过了第二次石油危机。以韩国开发研究院（KDI）为代表的数十家官办智库，为韩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出谋划策，作出了社会公认的贡献。不难看出，智库的质量与水平已经成为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

综合来讲，现代智库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资政辅政。以思想库和参谋助手的角色，为决策者提供政策思路和建议方案以影响决策，并对有关行动方案和实施效果作出论证、评估，为政策实施向社会作出必要的说明和引导。二是启

迪民智。通过深入广泛的调研和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以专家学者的角色撰写文章、出版论著、发表评论、开展研讨，对社会公众进行政策传播和普及。三是平衡分歧。在利益群体和诉求多元化的环境下，智库借助其客观、公正的立场提出政策观点，为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提供交流平台。四是聚贤荐才。西方国家的智库充分发挥人才“旋转门”作用。政府经常在智库的研究人员中选拔高级官员，而离任的政府高级官员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进入智库开展政策研究工作，继续发挥专长和影响力。官员在政府和智库之间的角色转换，进一步密切了政府与智库的联系，强化了智库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

建设高质量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时代要求

在我国革命和建设前期，我们党就高度重视决策咨询和调查研究工作，但尚未形成较为专业、完整的团队形式的智库。上世纪 70 年代后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继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发展中心”）等政策理论咨询研究机构。据上海社会科学院统计，目前我国比较活跃的各类智库有 200 多家（不包括高校智库），初步形成了官方智库为主、高校智库、企业智库和民间智库共同发展的格局。围绕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以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各类智库认真履行职责，产生了一批具有较高政策价值和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推动了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进程，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贡献了智慧和力量。有些智库在国际上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和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期，世情、国

·权威视点·

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所面临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前所未有,无论是改革方案还是重大政策制定的社会利益相关性、复杂性都不亚于以往任何时期,党中央、国务院对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以及决策正确度的要求越来越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变革的新时代已经发出了呼唤智库彰显能量的最强音,历史赋予智库的任务更为艰巨、责任更加重大。过去,我国智库应改革开放之运而生;当今,正是我国智库顺改革开放之势而为的大好时期。与时代新要求相比,我国智库发展还相对滞后。一是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的探索刚刚起步,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缺乏制度性保障,也未能得到系统性体现。二是智库对决策的影响多处于若即若离状态,在党和国家科学、民主决策体系中缺乏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安排。三是我国智库多以官方、半官方为主,智库本身难以平衡体制属性与政策研究独立性之间的关系。四是智库研究成果向决策咨询、社会效益转化的渠道不够畅通,效率有待提高。五是我国智库总体而言战略谋划和综合研判能力不足,政策研究质量和水平有限,尚不适应新时期决策的需要。

勇当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弄潮儿

使我国智库真正承担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必须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重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一方面,应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创造有利于智库健康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另一方面,各类智库要自强自立、有声有为,积极参与决策,正确影响决策。我国各类智库既要遵循决策咨询工作规律,充分吸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探索和创新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增强战略谋划能力和综合研判能力,不断提高决策咨询服务水平;更要充分认识我国政治体制和决策机制与西方国家有着明显差异,建设新型智库必须符合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特点,符合国情、党情、社情,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要求。通过建设高质量的中国新型智库,力争为各级党政组织及各类经济实体的决策提供管用的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提升国家软实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准确把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职责定位。各类智库建立背景不同,功能和职责定位也应准确把握。发展中心是直接为党中央、国务院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决策提供研究咨询服务的体制内智库。我们建设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就是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立科学高效、充满生机活力的体制机制;加强决策服务和专业能力建设,打造高层次的政策研究人才队伍;建立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的对外交流平台,提升统筹利用国内外各类智库资源和专业人才的能力。为此,要准确把握职能定位,认真遵循决策咨询工作规律。结合中央决策对智库需求的新特点,我们尝试开展“国家新型智库建设创新工程”建设,推进机构设置、科研机制、人才管理等方面的改革,着力提升研究质量和水平。一是在做好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长期性重大问题研究的同时,着力加强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难点问题的研究。二是加强政策研究的问题导向,着力提高政策建议对决策的实际应用价值。三是依托高水平的专家队伍,面向公众和国际社会解读国家重大公共政策,着力提高政策解读的准确性、影响力和社会效果。四是发挥智库的客观性和专业性优势,探索做好经济社会发展有关改革方案、重大政策及实施效果的第三方评估工作,着力提升评估的规范性、正确性和专业化水平。

勇于创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制机制。制度创新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关键,这就要求我们在创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制机制上下足功夫。一是建立高质量完成中央交办研究任务的保障体系。紧紧围绕中央关注的重大问题,从准确把握决策需求、快速组织开展研究、提高成果质量、加强政策建议的及时性和管用性等方面建立完整有力的服务保障程序。二是完善重大课题选题机制。在做好决策需求分析的基础上,根据问题导向和趋势导向相结合的原则,规划年度重点研究课题。三是建立灵活有效的科研组织机制。实行课题负责人制度,根据课题需要组建跨部门、跨领域课题组,集中优势力量并有效整合国内外研究资源参与决策咨询研究。四是实行研究成果分类送审制度和质量把关制度。上报的每一项研究成果,都要经过研究部门主要负责人审核、分管领导审改和主要领导审定三级质量把关。五是形成竞争导向的科研评估机制。提高科研组织、课题评审和业绩评价的透明度,强化竞争,提高评审标准和淘汰率,加大对优秀成果的激励力度。

不断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能力建设。根据服务决策、适度超前、相对独立的智库建设要求,我们要不断加强四个方面能力建设。一是提高综合研判和战略谋划的能力。世界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智库要善于运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研究

方法去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本质,及时发现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苗头性、趋势性的重大问题,前瞻性地作出战略谋划。二是提出科学可行政策建议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政策的正确程度与政策制定者的综合能力成正比,而智库政策咨询能力正是这一综合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智库的这一能力,其一要夯实学术理论根基;其二是提高自身政策水平;其三要深入社会实践;其四要实现前三者紧密结合、相互支撑。三是推动政策形成和实施的能力。智库的作用,就是力求掌握充分的信息、数据,以令人信服的分析、推理和研究结论,把应对经济社会问题和矛盾的政策建议提供给决策层,对政策设计的实现目标、实现动机、现实条件等作出透彻且合乎实际的阐述,积极推动有关政策的形成与实施。这也是智库决策影响力的直接表现。四是增强重大政策解读传播的能力。不仅要在国内提升政策解读的准确性、影响力,而且要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智库对话,开展政策对外解读,广泛传播中国的实践经验和政策主张,增强在全球主流媒体和国际组织平台的话语权。

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才队伍建设。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培养和造就一批德才兼备的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是关键。智库作为思想库,其影响力的实质在于研究人员的影响力,在于人才团队的影响力。要营造既坚持原则又宽松活跃,小荷“尽”露尖尖角、人皆可成才的人才成长环境,进而增强智库的人才吸引力。倡导研究人员要具备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具有优良的精神品质;秉持“唯实求真、守正出新”的政策研究价值观,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树立科学严谨、客观务实的思想作风,培养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品质。还要继续坚持开门办智库,在政策研究过程中尽可能吸收政府官员、企业高管、著名专家担任顾问或课题组成员;更多与世界银行、壳牌等国际著名研究机构、企业联合开展如《2030年的中国》《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中国中长期能源发展战略研究》《中国天然气发展战略研究》等重大项目研究;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建立顾问委员会、各领域顶尖专家库、访问学者研究制度;进一步通过举办高层次论坛、组织高水平的学术报告会等多种形式,加强与国内外各类智库和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著名专家学者的联系、交流、合作,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提高。

((据2014年04月22日《人民日报》))